

2019年6期

台湾政治

关于台湾民意与相关民意调查的若干观察

□ 林 劲

摘 要: 历经多年的发展,台湾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民意调查市场,民调机构形式多样,民调机构的政治立场、民调问题的设计、调查对象和民调数据的解释等因素都影响民调的结果。在各项公职选举过程中,各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既可以通过民调了解民意,也可以通过民调引导、诱导甚至刻意误导民意。台湾民意对于两岸关系议题的看法势必影响其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进而直接影响选举的结果。但由于选举结果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决定的,因此台湾民意关于两岸关系议题的看法对历次选举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2012年和2016年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过程及结果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现阶段台湾多数民调结果显示,台湾主流民意在两岸关系方面希望“维持现状”,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与台湾社会的普遍认知确实存在一定的落差,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当前台湾的社会心态和民众的认同问题。

关键词: 台湾民意; 民意调查; 台湾选举; 两岸关系

DOI:10.16650/j.cnki.xdtwyj.2019.06.004

在现代社会中,考察、判断及分析某项政治、经济或者社会议题的民意取向、特点、趋势以及影响,一般都是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获得的,而民意调查有电话询问、书面问卷和人员面访等多种形式。倘若要考察、判断及分析台湾民意及其相关要素的基本取向,那么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具体探讨台湾民意与相关民意调查的关系问题,其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进一步探讨。本文试就台湾选举过程中民意与相关民意调查的相互关系作初步分析,进而考察台湾民意对两岸关系议题的看法及其对于选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个时期以来台湾的社会心态和民众的认同问题。

一、现阶段台湾选举政治中的相关民意调查

台湾的民意调查机构包括多种类型,有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高等院校的民意调查机构、媒体的民意调查机构,还有大型基金会、政党及行政机构中负责民意调查的部门等。正是因为民意调查机构众多,所以民意调查的议题数量很多,调查的内容包括台湾内部事务和两岸关系议题等。台湾内部事务包括台湾当局执政满意度、政党信任度、县市长满意度、候选人支持度以及民意倾向类、经济状况类和生活指数类等调查议题;两岸关系议题包括反应民众的统“独”立场、自我身份认同观点、对两岸关系重大问题的看法、对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和朝野政党大陆政策的反应等调查议题。历经多年的发展,台湾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民意调查市场。总体来说,在台湾政治现实中,现有的民意调查

作者简介:林劲,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对于观察、分析和判断民意状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所有民调机构都强调自己秉持“公正、客观”的立场,因而所做的民调数据就是民意的真实反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影响民意调查结果的种种因素也无一例外地客观存在。

首先,台湾民意调查结果直接受制于蓝绿阵营及相关政治势力的立场。由于民意调查在台湾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台湾朝野政党都表示要把民意作为决策的基础,通过对民意的掌握或者决定施政措施、或者提出具体政策主张,当然也根据各政党的需要选择相应的民调数据继续引导民意,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其次,民意调查问题的设计、接受调查对象的条件设置和民意调查数据的解释都直接影响民意调查的结果和效果。问题设计的倾向性使同一议题民意调查的数据大不一样,亦即针对同一议题,各家民调机构由于问卷的设计、样本的选择各有不同,使得其所呈现的民调数据不同,甚至差异很大。对于接受调查对象的条件设置,既然设定调查对象的范围排斥某些群体,那么将影响取样的效果和调查的结果。此外,民意调查数据的解释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对于同一项民意调查数据,不同立场和需求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和看法,呈现各说各话的状况,亦可称之为“见仁见智”。

根据台湾政治体制的设计,现阶段台湾政党必须通过选举获胜才能取得政权,掌握全台的政治资源,获取政党的最大利益;只有取得政权,政党才能将本党的主张及意志转化为“公权力”。换言之,选票代表政党的民意基础,体现政党的具体实力。要赢得选举,必须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获得相当部分选民的支持,尤其在“两党制”基本成型之后常出现蓝绿对决的状况,候选人必须获得过半选民支持才能上台执政。

对于收集、了解、统计和分析某个阶段的社会民意,民意调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各

项公职选举过程中,不同政党、政治势力以及政治人物既可以通过民意调查了解民众对于某些选举议题、某些候选人的看法和支持率,也可以通过民意调查引导、诱导甚至刻意误导民众对于某些选举议题、某些候选人的看法和支持率。现阶段台湾政坛两大政党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提名都采取“全民调”方式,即委托民调机构进行一定期限的民意调查,以其结果决定候选人的提名。虽然这种提名方式似乎显得较为公平公正,但是党内的参选人仍然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操作;更有甚者,其他政党及政治势力也可以暗中进行操作,尽可能促使该党竞争力较弱的参选人胜出,台湾政坛及媒体称之为“灌水”。这实际上影响党内提名的公平性,也未必能真实地反映参选人的支持度及竞争力。这种现象已经多次出现,而且未来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由于台湾的民调系统较为发达,所以民调在选举过程中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从各个政党内部的候选人提名竞争开始直至各个政党及政治势力推出的候选人之间的竞选,民调几乎贯穿于直至投票前10天的整个竞选过程,甚至有民调机构还不失时机地进行选民投票后的“出口民调”。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在各项公职选举过程中显示出诸多民意及民调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选举的各方加以重视,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历次选举过程中,两岸政界、学界普遍关注各种民调机构有关候选人支持率的民调结果,甚至有不少人在一定程度上被各种民调结果所引导甚至误导,从而影响自身对选情及选举结果的判断。客观来说,多数民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方竞选的态势和候选人的支持率,可以作为观察选情的参考,但是都有其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对各个具体的民调结果作辩证、客观、理性的分析。

通过一个时期的考察,不难看出台湾各种

民调机构有其各自不同的党派势力支持,其政治背景和政治倾向迥异。从民调议题的设计、民调进行的时间到民调公布的动机都有值得探究之处。政治势力在选举过程中操纵民调的成分越来越大、痕迹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候选人实力相当、竞争激烈的选举中。因此,有长期观察及研究选举民调的台湾学者认为,各项民调都有其加权和误差的部分,只有主导民调工作的人士自己心知肚明,外界难以厘清。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程中,国民党、民进党都有明显操纵民调的动作,国民党从危机动员的角度有意压低马英九的支持率,以加大基层组织动员的力度,提升支持群众的投票率,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弃宋保马”;而民进党则是从鼓舞士气的角度有意抬高蔡英文的支持率。因此,造成马英九和蔡英文的支持率一直处于胶着状态,甚至出现过所谓的“死亡交叉”,从而显现选举竞争的白热化程度,这就相当程度地造成蓝营支持群众产生普遍的焦虑和恐慌的心态。与此同时,多次民调呈现出宋楚瑜的支持率偏高的状况,有人认为是绿营支持者为分化蓝营而故意“挺宋”且“灌水”所致,有人认为是蓝营对马英九不满的人“挺宋”所致。最终选举结果则是宋楚瑜的得票率极低,证明偏高的民调数据并不符合实际选情。

一般而言,选举结果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党的基本支持群众,即基本盘;二是政党及其候选人在政坛和社会的表现及发展潜力;三是选民在选举投票中的理性选择。与西方政治体制相类似,现阶段台湾在各项选举过程中也出现两种极为明显的、甚至可以称得上“畸形”的倾向,严重影响其所谓“民主政治”的品质。

首先,民主被简化为竞选,竞选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在选举中,候选人之间相互攻击,进行所谓的“抹黑”“抹红”“抹黄”及制造“突发事件”已到

不择手段、登峰造极的地步。实际上这就是政党及候选人对民意的宣导、引导,甚至是误导,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选票、赢得选举。

其次,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选票,迎合民意,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作出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建设、社会福利的承诺,作出政治人格的保证,甚至不惜在“神明”面前发誓,但最终“跳票”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即使能够兑现承诺但其所造成的恶果,还是得由整个社会及全体民众来承担。实际上这就是民意对政党及候选人的影响。换言之,即政党及候选人对民意的迎合、讨好,而目的只有一个,仍然是为了获得选票、赢得选举。

一般认为,选民通过理性思考作出决定,投下神圣而庄严的一票,但是很多选举的结果则表明,选民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严重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状态在媒体、金钱和商业炒作的综合作用之下,已经变得日益突出,而在台湾统“独”意识形态、省籍族群问题尖锐对立、政党长期对抗及社会严重撕裂的政治环境中,更是沦落到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地步。当代西方体制的所谓“程序万能”亦在台湾政坛充分体现,只要“程序正确”,当选政治人物的才能和品德如何似乎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将“程序正确”提升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其结果导致台湾社会及民众由此曾经付出也必将在未来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台湾民众曾经有过选错陈水扁的抱怨,2014年之后似乎也有选错马英九的抱怨,现阶段已经出现选错蔡英文的普遍抱怨。

如何理性观察台湾的选举民调是研究台湾选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具体分析各个民调机构及各项民调的背景及其客观性的同时,的确有必要考察和研究台湾民众应对民调的心态和对各种民调及其结果的真实看法,这似乎是一项更为复杂的认识民意的工作。

笔者认为,台湾民众应对民调的心态与实

际投票的心态是有一定差异的,应对民调的心态除了政治立场及其支持候选人的考量之外,还包含相当程度的情绪性。由于对执政当局施政表现的不满,而可能体现为具有敦促和警醒的成分;基于两岸关系因素对选举的影响,相当部分民众可能表现出逆反心理,有意不让某些相关方面在选前省心、省事。此外,台湾民众的拒答心态和回答民调议题的心理取向,除了对民调过多过滥而产生厌烦情绪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台湾的社会心理,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选举中有着不同的体现,由选举的“出口民调”与实际结果的差异即可见一斑。

诚然,台湾各种类型的民调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也就存在共同的局限性,或多或少产生引导、诱导乃至误导的作用。但因为台湾的民调具有反应及时、数量多而齐全、各类政治立场都得以表达等特点,因此只要结合岛内政治现实和两岸关系现状,结合民调机构的政治倾向,结合以往相关民调的数据,结合朝野政治势力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就仍然能通过民调一定程度地了解台湾民意。

二、台湾民意对两岸关系议题的看法及其对于选举的影响

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议题及相关政党的两岸政策主张的看法势必影响其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也就直接影响选举的结果。不过由于选举结果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决定的,因此这一因素对历次选举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两岸关系议题对于选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全台性选举中,即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中。各政党及候选人宣导自身的两岸政策主张,力争社会民众的认可及支持,同时抨击、批判竞争对手的两岸政策主张,从而影响选民的投票取向,以达到影响选举结果的目的。两岸关系议题对于选举的影响程度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决定的,这里提到的多种因素指的是台湾内部政党及政治势力的实力对比和竞争

态势,各政党及候选人对于两岸关系议题的宣导、炒作程度,竞选过程的两岸关系形势、当时的中美关系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等。此外,其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美国政府的相关态度及某种程度的介入,大陆某些因素的间接影响,以及涉及两岸关系的某些或大或小的突发事件,譬如2016年选举投票前发生的“周子瑜事件”等。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两岸关系议题在该次选举中的议题分量,从而产生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程度。

就近比较2012年和2016年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过程及结果,似乎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出两岸关系议题对于选举影响程度的差异。

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其成果是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忽视的,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大陆民众赴台观光旅游、陆资入台投资以及签订《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相关协议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海内外有目共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让广大台湾民众切切实实地获得实惠。各种民调都显示台湾主流民意乐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希望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主张;大多数中间选民对扩大两岸各方面交流、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民进党欲获得中间选民的选票,就不能一味反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检讨自身“为反对而反对”的策略,其保守的两岸政策主张不仅无法阻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而使自己被孤立和“边缘化”,这就要求民进党必须对其两岸政策进行适时的调整,否则就难以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典型事例当数民进党权衡利弊得失而宣布放弃以“反对签订ECFA”作为2010年“五都选举”的竞选诉求。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民进党一直未能对其现行的两岸政策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因此,两岸关系的重大积极变化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使民进党两岸政策主张成为其在政坛竞争的软肋,直接成为蔡英文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竞选诉求的短板,迫使其回避在两岸政策议题上与马英九进行正面的交锋,而选择以公共政策议题作为选战主打的诉求,抨击执政当局的施政能力、执政疏失以及政策的“跳票”。此外,蔡英文及民进党在选举后期不断在两岸议题上玩弄花样、抛出承诺,捉襟见肘,两岸政策成为蔡英文在竞选诉求上无法逃避的罩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和美国的战略利益考量相当程度地影响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总体选情,蔡英文以609万票落选,与马英九的差距近80万票,海内外许多评论认为民进党败在不承认“九二共识”。尽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对于马英九的胜选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能过分夸大,以至于看成决定性的因素,不能忽视具体候选人的个人因素的重要作用。在选后检讨中,蔡英文提出“距离执政最后一里路”的问题,外界普遍认为是指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主张。此后蔡英文在败选报告中认为,未来在实务上除了更深入研究大陆的变化与对台战略,也应更具体展开双向交流,摆脱“反中、锁‘国’”的错误刻板印象;并且表示民进党不能否认“经济恐吓牌”的影响,需加强处理大陆问题的能量与能力,才会得到社会信赖。因此民进党是否调整两岸政策,成为选后海内外各界关注的问题。

综观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后民进党关于两岸政策的讨论和争议,虽然党内多数人士认为其败选与两岸政策有关,但是在到底是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进行检讨的问题上则存在明显的分歧。^①虽然选举结果迫使民进党必须检讨其两岸政策,但是当时内外环境似乎尚未具备调整两岸政策主张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虽然民进党内围绕两岸政策召开一系列专题研讨会,展开一番争论,但并无实质性

进展,最终仅形成一份《检讨纪要》。

在第二任期内,由于马英九及国民党当局的执政绩效不佳、出现种种重大失误,爆发一系列严重事件,先后发生“油电双涨”事件、“美牛案”、“广大兴渔船”事件、洪仲丘事件、塑化剂事件、“十二年‘国教’”争议、馊油食安事件、“两岸服贸协议”争议和“太阳花学运”等,国民党当局都未能与社会民众进行有效宣导和沟通,无法妥善应对和处理,导致民怨沸腾,纷纷指责马英九“无能”,严重冲击国民党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的选情。此外,马英九与时任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政争”的僵持,造成行政与“立法”部门难以协调,不仅影响执政团队的顺利施政,而且使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的竞选整合出现严重问题,削弱其组织动员能力,干扰辅选助选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在人才培养、梯队建设、候选人提名制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明显的缺失,未能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最终导致国民党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遭遇惨败,民进党获得出乎各方意料的大胜,在全台6个“直辖市”与16个县市中,执政的国民党只维持1个“直辖市”5个县市的席次,民进党取得4个“直辖市”9个县市席次,执政县市的总人口超过台湾地区人口总数的60%,无党籍候选人取得1个“直辖市”2个县市席次,其中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是因民进党礼让及支持而当选的。两大政党实力发生明显的逆转,呈现在野党“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可见民进党实力回升,选举获胜,原因在于国民党执政的一系列缺失、内部无法有效整合,造成选票大量流失所致,并非民进党自身修正政策路线的结果。

2014年“九合一”选举结果对于民进党两岸政策主张的调整,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民进党由此坚信2016年能够重新上台执政,两岸政策主张的调整不再是重要因素,压力大幅度减小。党内部分人士认为,如果不需要

改变两岸政策就可以胜选,那又何必去碰触这一议题,否则反而可能引发内部争议,甚至发生内讧;同时将会受到“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强力掣肘,可能因此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失去部分基本选票。另一方面,民进党既然更加坚定上台执政的信心,那么就不能不思考如何向台湾民众展示自身具有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以取得选民的信任;不能不思考如何面对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前可能施加的压力;同时也不能不思考如何在选举前后处理与大陆的互动关系。^②

国民党在遭遇2014年“九合一”选举惨败之后,紧接着面对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全党笼罩着失败主义的怯战情绪,党内整合面临空前的危机,领导核心几乎崩盘,重量级人物互相掣肘,造成谁都不愿参选、最终由自称“抛砖引玉”的洪秀柱获得提名参选资格。此后的民调结果都显示,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率一直大幅领先,外界普遍认为蔡英文即使“躺着选都会赢”,因此国民党内要求“更换候选人”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国民党于10月中旬召开“临时全代会”决定废止对洪秀柱的提名,征召时任党主席的朱立伦为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候选人,之后选情不利的局面仍然未有明显的扭转。此外,同属蓝营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宣布参选,形成分裂的泛蓝阵营对阵团结的民进党。虽然其间发生“习马会”的历史性事件,客观上有利于提升国民党的竞选气势,然而选情的决定性因素是党内的有效整合和竞争力的提升,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既无法也无力做到,这就决定其败选下台已是难以挽回。

显而易见,两岸关系议题对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选情的影响程度不大,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当时国、民两党的竞争实力显得过于悬殊,即使选前两岸政策主张不作调整,民进党

仍然可能赢得2016年选举。此外,蔡英文曾经在2014年7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要民进党打赢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大陆就会自动调整来配合,美国会因大陆的调整而调整”,^③这种思维定式既影响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也在相当程度上误导台湾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蔡英文提出“维持现状”作为两岸政策主张的核心概念,并且获得美国官方的认可,这对于民众具有相当的迷惑和蒙蔽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近年来台湾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所谓“太阳花学运”和“反课纲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大多数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乎切身利益的认识不足,并没有意识到蔡英文胜选上台可能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尤其是年轻的“首投族”没有经历过20年前台海局势紧张、两岸关系震荡的年代,认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哪个政党胜选都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太大的影响,而且大多数年轻人选择支持蔡英文。^④民进党内普遍认为两岸问题虽然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不可避免的议题,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在竞选中采取将两岸议题边缘化的策略,从稳定选情考虑,避免在投票之前操作两岸议题,因为这不是民进党的强项,而是“短板”,必须要注重“止损”问题,尤其是在“习马会”之后,尽可能把两岸议题对自身的损害程度降到最低。况且在竞选后期,台湾社会已经弥漫“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希望“换党执政”的气氛,因此民众也就不会过多地关注两岸政策议题。

在上述基本态势下,蔡英文以得票率56%的绝对优势赢得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囊括超过60%的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席次,也就不足为奇。

三、现阶段台湾民意对两岸关系议题的看法及其相关民意调查分析

前已述及,2012年民进党在败选之后并未

实质性地对两岸政策主张的调整,却在2016年的“二合一”选举中大获全胜,由此表明两岸关系议题对于两次选举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差异。考察选举过程所反映出的涉及两岸关系方面的社会心态和民众认知等问题,不能不引发相关的思考。

台湾民意在两岸关系方面的呈现是社会各界对于两岸关系议题、台湾政党及政治势力的两岸政策主张、大陆对台方针政策以及涉及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及相关事件等的看法、情绪、愿望及价值判断等,并且与台湾的政党势力倾向、省籍族群、阶级阶层等问题密切联系,相关的民意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台湾民意的基本状态。

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多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台湾主流民意在两岸关系方面希望“维持现状”,这是马英九提出“不统、不独、不武”主张的社会基础;也是蔡英文“维持两岸现状”主张欺骗蒙蔽民众得逞的现实背景。2008年之后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两岸互信初步建立,两岸“三通”基本实现,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正常运行,《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相关协议的签订,双方社会相互了解和认识逐步加快加深,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局面已经形成,双方的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联系沟通机制的建立,乃至两岸领导人会面的实现,都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成果,台湾民众无疑是其主要的支持力量。但是,由于两岸政治对立仍然存在,敌对状态尚未结束,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差异难以超越,双方在两岸政治定位、军事安全和涉外事务等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因此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台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现实利益,在解决两岸政治对立条件及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显得尤为重要,以有效避免“台独”活动破坏现状,造成两岸关系的危机。与此同时,台湾主流民意要求平等、尊严、

不遭受战争动乱,有足够的“国际活动空间”。但是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以来,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关系发展再次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危机持续加深的境地,蔡英文已经无法兑现其“维持两岸现状”的承诺,造成台湾社会普遍的忧虑和不安。

不可否认,2008年5月以来的相关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统“独”立场方面,主张两岸统一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主张台独的比例仍然保持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的水平;在身份认同方面,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偏低,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偏高,与统“独”立场及主流民意所包含的消极因素相结合,为台湾某些政治势力及政治人物所津津乐道,并且以此作为对抗大陆对台政策的筹码。

由上述分析可见,台湾民意在两岸关系方面的呈现是一个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结合体。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湾政局演变来说,台湾民意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应该看到,台湾民意的形成和变化受制于多种多样因素的引导和影响,民意也对台湾政党和政治人物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相关的民调数据显示,在2008年至2016年国民党执政时期,比之于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时期,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方面,似乎并无太大的改变,甚至有所倒退,这与台湾政治多元化及社会心理平衡的复杂状态密切相关,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与台湾社会的普遍认知确实存在一定的落差,涉及到一个时期以来台湾的社会心态和民众的认同问题,对此应当作进一步认真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

首先,马英九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获胜的,他胜选上台并非表明台湾统“独”民意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不表明台湾省籍族群矛盾已经得以根本缓解。而他主政后也并未倾力扭转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台湾主体意

识”逐步强化的局面。

其次,尽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两岸经贸交流的扩大难免对部分台湾民众的利益造成程度不同的冲击,大陆的大规模“让利”,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为某些权贵和财团所获得,并未使基层民众普遍“有感”,因此2016年的选举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部分民众对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利益再分配的不满心态。两岸各领域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民进党所利用而夸大地渲染,造成台湾社会的负面观感。

再次,两岸关系重大积极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使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是否走得太快、是否面临政治谈判阶段的到来产生疑虑和担心。由于台湾社会对大陆严重缺乏信任感,部分民众对大陆实力的大幅提升和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难免产生“恐中惧中”的情绪,产生“被统一”的焦虑感。这与在陈水扁主政时期推行“台独”路线,台湾社会民众支持“统一”的比率反而提升,是同一种社会心理状态的必然反映。

最后,必须扩大考察的视野,不能仅仅停留于统“独”争议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台湾民众的认同问题。毫无疑问,台湾民众的认同问题相当程度包含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因素。而民进党不失时机且最大限度地迎合和利用某个阶段及反映某个议题的主流民意趋向,刻意炒作,推波助澜,无疑对民众的认同产生严重的影响。诸如2019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利用“香港修例风波”,极力炒作及蓄意激发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的“恐惧感”,乃至于大肆渲染所谓的“亡国感”。从政治目的来看,民进党迎合及利用台湾的社会心态和民众的认同问题,并且刻意渲染、固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与台湾社会普遍认知的落差,既可缓解要求其调整两岸政策的社会压力,又可从中获取政治资源和政党利益。同

时应当看到,许多民众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南部的民众,并非支持“台独”主张而支持民进党,而是因为反对国民党而别无选择地支持民进党,而反对国民党又是多种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由此可见,所谓“深绿势力”,即坚定支持民进党的社会力量,不能完全等同于“台独基本教义派”。

综上所述,台湾的选举结果和政党轮替有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结果的最终代价必须由台湾全体民众来承担。虽然2016年“二合一”选举结果不能完全归咎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必须认真地思考为什么两岸关系议题在2016年“二合一”选举中对于民进党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乃至忽略不计的地步,进而必须深入地思考为什么多数台湾民众能够接受和选择支持仍然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蔡英文和仍然背负“台独党纲”包袱的民进党。客观平实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将有利于争取台湾民心、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瞻而言,我们不难看出,应对和改变台湾民众的认同问题是一项综合性工程。然而,由相互了解、理解,到逐步地消除歧见、偏见和不良观感,逐步地减小和克服差异,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因此,在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本方向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大陆在增进两岸政治互信,争取台湾民心方面势必面临更为艰巨且复杂的任务。

注 释:

①②④林劲《2008年以来蔡英文两岸政策主张变化分析》,《台湾研究》2016年第4期。

③《小英:打赢选战 大陆会朝绿调整》,台湾“中时电子报”2014年7月10日 <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40710000402-260102>。

(责任编辑:刘凌斌)